欲見「中華門」

姚船

名居人語

聖誕新年期間，親友間的電話來往自是頻仍，住在不同城市，不同國家，問候一聲，祝節日快樂，順便談一下個人和家庭有什麼good news，令人倍感親切溫馨。今年我和美加的親友通話，不忘告訴他們一個好消息：多倫多東區唐人街的中華門已正式奠基建設，夏天大家再來這裡玩的時候，整座雄偉壯觀的中華門就能眞切呈現在眼前。

縱觀世界各大城市的唐人街，如倫敦、紐約、東京等，都有象徵中華文化的特色建築——中華門。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唐人街在兩條馬路交叉點的四方，就有三座中華門牌樓，成爲華埠地標。唯獨目前加國華人最多聚居的多倫多，卻沒有這樣標誌性建築，令不少華人，尤其是老華僑，不能不感到十分遺憾。當然，並非不爲，而是難爲。交通疏導、市政建設規劃、資金，甚至敏感的族裔問題，都是建造中華門需要面對的困難。

多倫多具名的唐人街有兩處，一是登打士西街夾士巴丹拿道的中區華埠，另是芝蘭東街夾百老匯的東區華埠，以中區華埠規模較大，倘能把中華門建在那裡，最爲理想。可惜此地交通十分繁忙，多年來，每每提起，交通評估這一關都難通過。一九九八年，以東區唐人街華商會爲主的機構提出建造東區華埠中華門方案，得到各方比較積極回應。經過十年不斷努力，終於夢想成眞。二〇〇八年十月底，中華門正式破土開建，預計〇九年六月竣工落成。

建設中的中華門高六十呎，寬也六十呎，琉璃瓦頂傳統中國式牌樓風格。「中華門」題刻牌匾、一對漢白玉石獅和「鐵路華工」、「龍鳳呈祥」、「長城」、「熊貓」等石刻浮雕裝飾由中國國務院僑辦捐贈，整個牌樓建築費用需一百萬加幣，多市政府出資四十二萬，其餘由民間籌款得來。多倫多市長苗大偉在中華門動工儀式講話中，讚揚華人對加拿大和多倫多的貢獻，指出建造中華門正是華人不懈努力和才華的見證。不少華人都感慨地說，中華門的建造，匯聚了各方力量，也得到加中政府的鼎力支持，既彰顯中華文化，也是加拿大多元文化社會呈現的又一奇葩。

嚴冬過後，在春天的孕育下，夏日草綠花紅的多倫多將增添一個別具一格的新景點——拔地而起的中華門。屆時，有朋自遠方來，我肯定會帶他們到此遊覽一番。其實，將來在此流連忘返的又豈止是華人，相信各種不同膚色族裔的人也樂意來唐人街，一睹中華文化燦爛的風彩。

曹雪松的《紅橋集》

許定銘

讀書亭

曹雪松一九三一年進入「天一」影片公司任編劇，編寫了《二孤女》、《熱血青年》、《鐘聲響了》……等劇本，後以編寫《王先生的秘密》受人注意而成影劇人。很多人不知道他早在江蘇省立農業學校就讀時已開始創作，詩、小說和劇本均有涉獵。後來在上海大學與丁丁同學，因同樣愛好文藝，經常走在一起，一九二五年還合編上海新群社的文藝月刊《心群》。

曹雪松的創作不少，有《愛的花園》（上海群衆圖書公司，一九二七）、《火榴》（上海尚志書屋，一九二八）、《紅橋集》（上海南星書店，一九二八）、《心的慘泣》（上海大東書局，一九二九）、《雪茵情書》（上海現代書局，一九二九）、《詩人的情書》（上海現代書局，一九三一）……等十多種。

如今大家見到封面那麼漂亮的《紅橋集》，雖然同是上海南星書店版，卻是一九三五年的再版，不知初版本是否也那麼好看？《紅橋集》是本三十二開，一四六頁的散文集，收《紅橋》、《歌女》、《送你踏上征途後》、《別上海》、《飄零淚》……等十一篇散文。書名《紅橋集》與一段浪漫的愛情有關，曹雪松與女友吳克茵相戀時，就經常在「紅橋」上散步、纏綿，這裡埋下了他待萌芽的愛情種籽！

「異論者就該餓死」嗎

舒聖祥

如是我見

因在汶川地震中扔下學生獨自逃生引發網民憤怒，並被稱爲「范跑跑」的原北大歷史系高材生范美忠，將正式受聘於北京某教育學校，擔任該校文科教研室主任和潛能開發研究院研究員，並將在中央民族大學禮堂公講人文關懷及如何考上北大。——消息既出，可謂「輿情嘩然」。很多人對此感到悲哀甚至憤怒，有人認爲是那所被隱去了名稱的學校在炒作，更有人高呼「沒人性的范跑跑就該沒工作」。

顯然，很多人仍然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范跑跑，在表達憤怒情緒的時候，都與「素質低劣」的范跑跑「劃清了界限」。但是如果我們願意眞誠一點，能在想像中讓自己設身處地於地震現場，至少有相當一部分人可能不會像他們今天自認爲的那般道德高尚。要求別人做聖賢是簡單的，但我們自己卻可能原本也是一個凡人。對於范跑跑在地震那一刻的逃跑表現，說到底只是一個凡人的行爲，雖然不值得提倡，但在一個公交車讓座尚且需要頻出怪招的國度，凡人向凡人舉起道德大棒，是不是有點「五十步笑百步」？

范跑跑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爭論，根本原因不在其行爲，而在於他那被指「得意洋洋」的事後言論。人們用「無恥」這樣的詞彙來形容的，主要不是他的作爲，而是他的言論。是的，屈從於人性弱點之後，非但不懺悔反而要大肆張揚並且高聲肯定，對身爲凡人卻渴望出現更多聖賢的人們來說，確有某種「挑釁」的意味。從意識形態高度統一的社會中走過來的人們，或許一時之間無法適應這種高度個性化的價值觀，於是理性辯論改爲口水辱罵。

在我們的價值觀中，范跑跑無疑是一個「異論者」。此前我以爲，我們需要思考的僅僅是：一個「異論者」有沒有表達觀點的權利。現在從范跑跑重新就業引起的輿論炮轟看來，或許我們還需退一步思考：一個「異論者」有沒有生存的權利。出現前一個問題本已經足夠悲哀了，出現第二個問題則簡直是一種巨大的社會倒退，讓人再次依稀看到了當年的「運動遺風」。

爲什麼我們會對范跑跑重新就業感到悲哀甚至憤怒，難道范跑跑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嗎？范跑跑並未觸犯任何現行法律，也並未被剝奪任何自由公民的權利，他只不過是表達了一個與我們不一樣的觀點而已，重新就業難道不再正常不過嗎？當然，范跑跑重新就業的單位是一所學校，這或許會比較「敏感」。但是，既然學校和范跑跑都有自主選擇的權利，學校必然會對自己的學生負責，我們又有什麼好悲哀和憤怒的呢？

關於范跑跑有沒有資格當老師，我認爲，除非我們發明一種神奇的機器，在挑選老師的時候能把每個人頭腦中那些被認爲是陰暗的或者是不高尚的想法都準確地辨識出來，否則，不讓范跑跑當老師不僅毫無公平性可言，而且只能起到一個效果，那就是：要想當老師，首先學會虛僞。我覺得，公共話語平台上的「異論者」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的「異論者」都戴着一個虛僞的面具，在不爲人知的背地裡將自己那些「異論」一一付諸實施，卻在人面前高舉討伐的旗幟。只要在法律的許可範圍之內，「異論者」就該獲得一個自由生存的空間。價值體系的進步和道德水準的提高，從來不是靠暴力打倒「異論者」得以實現的。范跑跑能夠重新就業並不可悲，相反卻顯示了當今社會的包容性；只能容許一種觀點存在，即使你不同意也得虛僞點頭的，那種「異論者就該餓死」的社會才眞正可悲。

毛肚

青絲

飲食男女

到茶樓喝早茶，麻辣毛肚是一道很常見的滷菜。盛在竹子小蒸籠裡的肚片，被紅油裹染得紅艷艷的，看起來非常誘人。品茗之餘用以佐味，綿軟之中又不失韌脆，雖非珍饈，亦爲助興之佳品。

毛肚其實就是牛肚。牛是一種奇異的草食動物，共有四個胃，毛肚乃是其中之一。但關於毛肚的認定，各地之間也是不同，如四川一帶把牛的百葉胃叫做毛肚。而在廣西，牛肚則被分爲蜂窩肚、牛百葉、光肚、毛肚四種，毛肚和百葉肚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部位，做法和吃法也有很大的區別。

毛肚是冬天吃火鍋的時髦食品，將之切成薄片，灑以薑末，再滴幾滴酒，然後用花生油醃漬，切忌放鹽。因爲鹽會把肚片中的水分逼出來，從而失去韌脆的口感。此與電影《飲食男女》裡面提到的魚蒸熟之前不能放鹽，道理是相通的。熬一鍋清湯作爲火鍋湯底，把毛肚片放在沸湯裡燙熟了吃。毛肚不堪久煮，火候稍過就會韌如橡皮，咬嚼不動，故燙食的時候須用撈籬，以便掌握火候，也就是在沸湯中略略一燙即得。此時，若取一棵大葱切碎，佐以檸檬及醬油辣椒等味料調配成味碟，蘸就而食，味道爽脆鮮美，臻至妙境矣。

一旦天氣回暖，吃火鍋的人沒那麼多，毛肚的價格就會降下來，而這時候，毛肚的吃法也是不同的。把毛肚洗淨，加八角、桂皮、茴香、草果等香料，調好鹽味，放入高壓鍋裡燜煮，及至入味，取出切成薄片。把韮菜苔切成寸許長的段，酸薑切得細如髮絲，另備葱白若干。鍋燒熱之後，先把葱白炒香，然後根據各自吃辣的段位酌情添加乾辣子，把韮菜苔、酸薑絲及毛肚片一同倒入，以猛火翻炒，再澆上蚝油拌勻即可。由於毛肚經過高壓鍋燜煮，已然綿軟入味，佐以清爽的韮菜苔和酸薑絲烹炒，香濃且兼脆嫩酸辣數味，下酒就飯，無不相宜。

文豪的箴言

葉周

近日讀了巴金五十多年前翻譯的一本小冊子，是俄國作家高爾基的作品《回憶契訶夫》。其中描述了契訶夫與人交際時的一些趣事。

契訶夫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和戲劇家，他的短篇小說尤其精彩。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挖掘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以幽默的故事加以渲染，塑造出極具時代特點的人物形象，生動表現了特定社會氛圍中的人物個性。他的代表作《變色龍》堪稱俄國文學史上的經典，成爲見風使舵、投機鑽營者的代名詞。

高爾基這樣描寫契訶夫：「每一個人在他的面前都會不由自主地起一種變得更單純、更眞實、更是自己的慾望，我不此一次地在那兒看到人們怎樣地拋掉那些書本上辭句做成的五顏六色的裝飾品，……凡是人用來裝飾自己讓自己顯得『更重要』的一切大吹大擂的、虛張聲勢的、外來的多餘東西都使他感到不舒服，我並且注意到他每一次看見人這樣漂亮地打扮起來的時候，他就想把他從這種重而無用的漂亮衣服中解放出來，這種衣服反而損害了那個人的本來面目與他活的靈魂。」

一次三位衣着華麗的太太來見契訶夫，和契訶夫談論起希臘和土爾其正在進行的戰爭。

一位太太問：「戰爭將來怎樣結束？」

契訶夫說：「大概是和平。」

「那麼哪一方面勝利呢？」

「我以爲是強的一方勝利。」

「那麼照你看來哪一方面是強的？」

「就是營養好教育高的一方面。」

「啊！多聰明！」一位太太誇張地讚美道。

「你比較喜歡哪一方啊，是希臘人還是土爾其人？」另一位太太緊接着問。

契訶夫和藹地看了她一眼，帶着親切溫和的微笑回答道：「我喜歡蜜餞……你呢……你喜歡它嗎？」

於是三位太太像掉進了水滴的油鍋，熱鬧地爭相回答：「很喜歡！」「特別是阿布立科索店裡的。」「那多麼香啊！」她們即刻表現出對蜜餞有着廣博的學問和知識，她們不用再裝着對她們從沒想過的異國的戰事的關心了。臨走的時候太太們還快樂地說要送蜜餞給契訶夫呢。

送走了客人，契訶夫幽默地對高爾基說：「每個人都應該講自己的話。」

高爾基爲此感歎道：「契訶夫永遠都是他自己，他的內心是自由的，他從來不會按照別人所期待的契訶夫而活着。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並且設法使來見他的人也變得單純起來。」

在翻譯了高爾基的《回憶契訶夫》後三十多年後，經歷了「文革」苦難歲月的磨難倖存下來的巴金，在他的《隨想錄》中呼籲：「人只有講眞話，才能夠認眞地活下去。」他生動地爲讀者描繪了一幅荒唐年代中的荒唐現象。聯繫到他從反右以後參加的許多大大小小的會議，他感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表態，說空話，說假話。起初聽別人說，後來自己跟着別人說，再後來自己同別人一起說。……但是一個會接一個會開下去，我終於感覺到必須摔掉『獨立思考』這個包袱，才能『輕裝前進』，因為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給改造過來了。」

巴金所經歷的那將近二十年是提倡人云亦云的年代。人似乎都要披上一層僞裝才能生存下來，活得好一點。在這種高壓狀態下的生存壓迫出了許多言不由衷的套話、假話。但是巴金曾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在上海市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勇敢地作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報告。他直率而言：

「既然打着作家的招牌，就必須認眞寫作，必須重視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新中國的作家更不應該有但求無過的顧慮。……在我們新社會裡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喜歡製造簡單的框框，也滿足於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些框框，更願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裡頭。倘使有人不肯鑽進他們的框框裡去，倘使別人的花園裡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不同的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為什麼我們文學藝術的百花園中還不見花紅似海、百鳥朝凰？為什麼在我們的報刊上許多人喜歡重複用着同樣的辭彙和字句？」這是禁錮之後難得的一次直率表達，可是巴金的言論很快受到批判，揮舞「棍棒」的就是日後成爲「四人幫」一員的姚文元。

「文革」結束後。我曾拜訪過巴金。先父以群的冤案得到平反，巴金在追悼會上致了悼詞。追悼會後，媽媽帶着我和兄弟們去巴金的家裡向他道謝，我還記得那天的情形，文學評論家孔羅蓀也在。

「謝謝您！」媽媽和巴金握手時說。

「你要保重自己，孩子們都長大了，很不容易。」巴金看着我們。

「孩子們總算還聽話。」

「那個時候，孩子們還很小吧？」

「最大的十六歲，最小的四歲。」

「才四歲啊！」巴金痛苦地搖了搖頭。「你那時又要工作，怎麼帶孩子？」

「我的姨母幫我。」

「她還好嗎？」

「她還好。」

「喔，我記得追悼會的時候看見她了。」

臨近會面結束的時候，巴金的視線望着面前的地板，聲調極其低沉地說：「以群、蕭珊都沒有能夠活到今天，眞可惜！」巴金的夫人蕭珊在「文革」中病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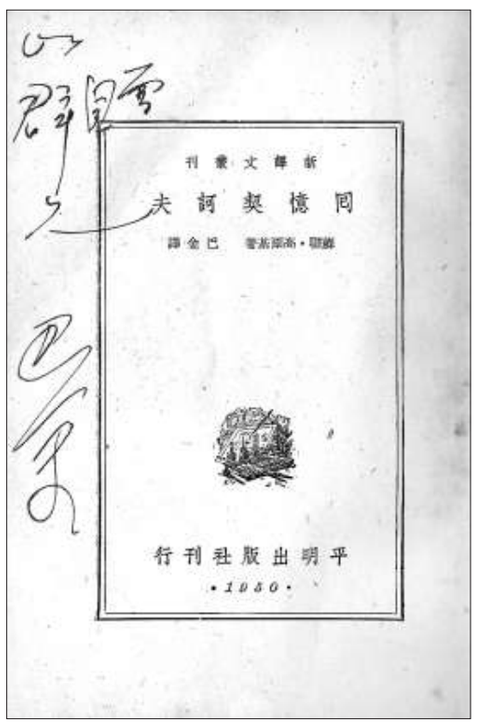
談話的氣氛是平靜的，有一半的時間由沉默佔去了。巴金坐在茶几旁的座椅裡，沉思的目光從他的老式的眼鏡後面望着我們。他沒有說過任何一句慷慨之詞，也沒有豪言壯語，每一句話的結構都是那麼簡單。這也讓我看見了一個眞實的巴金。我以前也見過巴金陪外賓一起到我們家作客，那時他有說有笑。可是「文革」後再見到他，他愈加沉默寡言了，我幾乎沒有從他臉上看見過笑容。冰心說過一句話，「痛苦的時候就是巴金快樂的時候。」這應該指的是「文革」以後的巴金。

斗轉星移，以思想解放爲先導的改革開放運動開啓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徹底解放了人們思想的禁錮，人開始從服裝、思想和行爲上逐漸顯示出各自的個性。個體的獨立和特色開始受到尊重和重視。社會恢復了渴望眞誠，奉獻眞心的良好風氣。人性的回歸帶動了去僞存眞的說人話和說眞話的風氣。

九十年代以後，當商業大潮席捲全國時，社會風尚中的眞誠相待又開始在充滿銅臭味的氛圍中變成稀缺資源。商場上的應酬、官場上的奉承、情場上的虛僞使眞實消失，個性奄滅。純粹物戀的婚姻連性的吸引都放棄。官本位的名利追逐使充滿個性的人完全蛻變。

魯迅在文章《立論》中曾描述了另外一種情形：「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闔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於是收回幾句恭維。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說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你……如果你願意既不謊人，也不遭打。那麼，你只能說：『啊呀！這孩子呵！您瞧！多麼……。阿唷！哈哈！』」

魯迅把人的語境做了睿智的放大，說恭維話的得到好報，說不合時宜的大實話的，就成了被人痛打的。那麼人到底應該怎麼說話呢？顯然，什麼場合說什麼話，也是世俗交往的一種禮儀規範。所以，說話有無數不同的語境，入鄉隨俗，尊重對方是人間交往的禮儀所在。這時候說一些客氣的話，應景的話也不必苛求。但是要做一個眞實的人，卻不能缺少說眞話，說實話，說自己想說的話的勇氣。尤其是在交友和共事時，人們會倍加珍惜坦誠相待。中外文豪們的名言：契訶夫的「每個人都應該講自己的話。」巴金的「人只有講眞話，才能夠認眞地活下去。」是人類良知渴望眞誠的一脈相承的追求，也都應該成爲我們爲人處世的箴言。眞誠是一種高尚的素質，需要勇氣和執着扶持。如果一個社會氛圍不提倡和培養這樣的素質，虛僞必將甚囂塵上。



巴金贈予以群的《回憶契訶夫》（資料圖片）

鐘聲

宋步明

人生在線

在聲音中我沉醉傾聽鐘聲，已記不清是誰這樣說過：「在所有的聲音中，沒有什麼比鐘聲更接近天堂」。剛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的作家遲子建也這樣說過：「鐘聲禪意深濃，是一種源於生命本體的鐘聲，一種心靈之聲。」香港歌星譚詠麟曾經回憶，有一次在旅途中被遠遠傳來的鐘聲深深感動了，那是在歐洲的一個鄉間，曠遠的山坡上有一小小的教堂，教堂裡發出陣陣的鐘聲，鐘聲發出澄淨的聲音，讓他一下子就感動了，那鐘聲就在車廂裡迴響，響在他整個長長的旅途裡，溫暖了譚詠麟長長的旅程，這次由鐘聲相伴的旅程，似乎讓他難以忘記，久久回味。不久，他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曾經》：「曾經朝晚都相見／曾經講我的志願／幕幕印象揭開童年／是你是我在當天……」

法國畫家米勒是十九世紀法國最傑出的以代表農民題材而著稱的現實主義畫家。他讓我們從他的油畫中聽到了鐘聲。那是世界聞名的傑作《晚鐘》，據說在二〇〇八年五月他的《拾穗》、《晚鐘》兩幅作品首次同時離開法國奧塞美術館到台灣展覽，台灣方面爲兩幅畫投保一億歐元的巨額保險，這幅畫現在還是價值連城，而在當時，米勒花了好長時間才將這曠世之作賣出，賣出的價僅僅才夠他用來作這幅畫的顏料錢。我們不會忘記那些令人震撼的畫面：歐洲某個鄉村的田野，遙遠又空曠，鉛雲低垂，秋風中傳來遠處教堂的鐘聲，田野上那位年輕農婦停下手中的活計，在原地急忙站起身來祈禱，而她的丈夫摘下帽子，虔誠有眞摯的神情定格在暮色降臨的靜謐裡，在這畫面上，我們也和那對夫婦一樣，聽到了晚鐘的聲音，那一刻是神聖的，無論是羈旅的遊子，還是終日辛苦的勞碌者，焦灼不安的心得到了片刻的安謐和安慰，痛苦、屈辱、悔恨和不安都會在晚風中隨風而去。

鐘聲在幾千年中國的歷史中也一直在悠揚，「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這些都是吟誦鐘聲名句，有一次旅行在外與一古剎相遇，一幅楹聯也讓人過目不忘，「晨鐘暮鼓驚醒名利客，佛舍經聲度脫迷夢人」。

另有一種鐘聲，會帶你走得更遠。「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是唐詩人張繼的鐘聲，位於蘇州楓橋的寒山寺鐘聲，已成爲一種文化符號，一首夜泊楓橋讓一個荒村小寺成爲千秋名橋，鐘聲詩韻傳千古。一時興起，筆者也曾興致勃勃前往蘇州楓橋聽鐘聲。然而，天地逆旅，人生如寄，早已不見徐徐落下的明月，啼叫的烏鴉，滿天的寒霜，江邊的楓樹和點點的漁火，只見沿河兩岸鱗次櫛比的店舖，粉牆黛瓦的民居，一派人聲鼎沸和熱鬧，而寒山寺的鐘聲也響個不停，早就沒有了張繼鐘聲的韻味，導遊揮着小旗，遊客趨之若鶩，張繼的鐘聲已無可尋。恍惚之間，突然想起那次輾轉千里在深山古寺裡傳出來的鐘聲，沉穩、雄渾、明亮，心中不禁得到一些慰藉，心胸突然也開闊了起來。

愛叫官銜的古代文人

陳魯民

文化什錦

古代文人的稱呼很繁雜，有字、有號，什麼時候用字，什麼時候用號，都很有講究，用錯了要貽笑大方的。譬如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明代文學家歸有光，字熙甫，號震川；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等。

還有種種別稱，也頗流行。其中一種是用文人家鄉來代稱文人的。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還因爲家是江西臨川人，又稱王臨川，他有一本詩集就叫《王臨川集》。柳宗元，字子厚。因是河東（今山西永濟）人，世稱柳河東，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韓愈，字退之。河南河陽（今孟縣）人，因祖籍昌黎。故世稱韓昌黎。

比較起來，文人最喜歡的別稱還是官銜，大概是官本位的影響所至，文人再出名，成就再輝煌，在一些世俗的人也包括文人自己眼裡，都不如叫官銜好聽。李煜，大詩人，本是個亡國皇帝，「鳳凰落地不如雞」，偏偏還要叫他李後主或南唐後主。韓愈，儘管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也未能免俗，因任過一段吏部侍郎，還是叫他韓吏部。王羲之，書聖也，世人卻喜歡叫他王右軍，一個大約副科級官員的稱謂。杜甫，一代詩聖，只當過幾天的檢校工部員外郎，是個沒什麼實權的芝麻粒閒官，因而被稱爲杜工部。阮籍，「竹林七賢」之一，雖博學多識，崇尚老莊，蔑視禮教，對「禮俗之士」常以「白眼」相視，卻因爲任過一個相當於排長的步兵校尉，故後世稱「阮步兵」，實在是羞辱他了。最可笑的是柳永，既然「奉旨填詞」，那就好好去當你的白衣卿相，寫你的《望海潮》、《雨霖鈴》、《八聲甘州》，可他不甘寂寞，居然也混了個不尷不尬、可有可無的小官屯田員外郎，後人因此叫他柳屯田，眞不知是捧他還是損他。

所幸還有那麼幾個例外。蘇軾雖然當過杭州通判、太守、黃州團練副使，卻沒有人叫他蘇團練、蘇太守什麼的，要那樣叫就實在是俗不可耐了。就是因爲不肯「爲五斗米折腰」，陶淵明只當了八十多天的彭澤令，屁股還沒坐熱，便棄職而去，你若再叫陶縣令，那還不是在罵他嗎？還有鄭燮，幹了十二年縣太爺，也算是官場老資格了，卻不喜歡人家叫他鄭縣令，自稱鄭大、鄭大郎，或題板橋居士、板橋道人，晚年自署板橋老人。

如果還沿用古文人的叫法與別稱，當代的文化名人那可就熱鬧了。魯迅祖籍紹興，就該叫魯紹興，好歹當過幾天教育部的小官僉事，還可叫魯僉事；胡適，安徽績溪人，就叫胡績溪，當過校長、大使，若揀官大的說，可稱胡大使；巴金，生在成都，就叫巴成都，又幹了二十多年的作協主席，自然要叫巴主席了；王蒙，河北南皮人，可稱王南皮，當過文化部長，可稱王部長；賈平凹，陝西丹鳳人，可稱賈丹鳳，現任《美文》編輯部主編，只好叫賈主編，雖然小點，畢竟也是個官。

好在時過境遷，文化人也與時俱進了，今天雖然官本位仍很流行，但文化人叫官銜的已很少見了，特別是對那些已經在官員位置上退下來的文人，這也是個不小的進步，畢竟文人就是文人，最終要靠成果吃飯。雖然郭沫若、茅盾、賀敬之、劉白羽都當過相當高職務的大官，副委員長、宣傳部長、文化部長什麼的，但不論哪本文學史，說到他們時記載都是詩人、小說家、散文家。這既簡便好記，又具文化色彩，遠比古代文人繁雜而又俗氣的別稱要強得多。